

# 张闻天对土地革命时期“左”倾统一战线的修正

许佳君 杨 涛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全党占据了统治地位,造成统战工作的混乱。刚从苏联回国的张闻天不可避免地在实际工作中宣传和推行了“左”的政策。民族危机的加重和全国各阶层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深深地影响和教育着张闻天,促使他在统一战线方面开始突破“左”的固定公式,注意团结更广泛的社会力量。这种突破首先体现在他自己负责和熟悉的宣传工作中,反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提出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思想。

**关键词** 张闻天;“左”倾统一战线;修正

**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5)04-0022-04

由于张闻天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使得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这既是他摆脱“左”倾教条主义束缚的过程,也是中国革命转向抗日战争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要深刻把握张闻天的统一战线思想,必须把握张闻天从“左”倾错误中摆脱出来的巨大历史意义。

## 一、张闻天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统一战线“左”的错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资产阶级退出了革命营垒,但并没有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仍然受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革命统一战线只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但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仍未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要求党在统一战线方面把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回革命队伍,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但是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却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反革命来对待。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虽然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但是在统一战线方面把反帝反封建与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并提,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不能正确估计中间派的作用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实行打击“中间派”的“左”的政策,结果不能争取和团结更多的可

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经过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全党占据了统治地位,全面推行“左”的错误,更加强调打击“中间营垒”,实行关门主义,造成统战工作的混乱。

张闻天于1932年2月回到中国,在这种背景下投身革命实践。这时六届四中全会已经闭幕,张闻天虽然在苏联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过分迷信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判断和指示,缺乏革命实践的锻炼,对中国国情不了解,而且一回国就被安排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岗位上,使得他没能超越历史和所处环境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在实际工作中宣传和推行当时中共中央的“左”的政策。在统一战线方面,主要是照搬“左”的公式,视中间派别为最危险敌人,对其采取揭露打击的方针。主要表现在:一是将反帝反封建与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并提,宣传中共六大决议的错误方面。如张闻天为批判托陈取消派所写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在捍卫和宣传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批判托陈取消派谬论的同时,未能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区别,把民族资产阶级也当作中国革命的对象。二是不能正确认识九一八事变后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继续批判中间派。九一八事变引起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日矛盾加剧,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工人和学生始终是运动的主力军。在工农学生抗日浪潮的推动下,

收稿日期 2005-04-15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张闻天思想研究”(02SJD810007)

作者简介 许佳君(1966—),男,江苏淮安人,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投资项目和社会发展研究、张闻天思想研究。

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的代表人物纷纷发表言论,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停止反共内战政策。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分化。1931年10月,一部分东北军首先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组成抗日义勇军、抗日自卫军,奋起抗日。形势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清醒认识和把握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情况下国内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动,把民族民主革命推向前进。但是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中共临时中央并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相反却继续做出一系列“左”的决议,并在实际工作中继续推行。由于“左”的东西蒙住了眼睛,中共临时中央看不到中间派别积极抗日的要求和因此发生的变化,也看不到国民党内部正在发生的分化和破裂,相反却照搬中间势力是最危险敌人的固定公式,认为中间势力“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它的,还是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因此“这些派别是最危险地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法纪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sup>[1]</sup>”。这样在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后中共不能提出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通过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来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自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张闻天不可避免地要在自己所负责的宣传工作中宣传中共临时中央决议,贯彻集中力量打击中间派别的“左”的观点和政策,继续犯“左”的错误。如1931年10月张闻天写的《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国民党的统治》,就是一篇贯彻“左”倾错误路线的代表性文章,没有看到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把中间派别(国家主义派、新月派、社会与教育派和托陈取消派)出于对蒋介石的不满而提出的民主要求看成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欺骗,“给了国民党以很大的帮助”;“我们的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对这些派别的斗争。<sup>[2]</sup>这种“左”的错误在1932年淞沪会战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十九路军和蒋介石嫡系第五军违反不抵抗政策,奋起抵抗,同时全中国也出现了一个抗日民族运动高涨的浪潮。包括张闻天在内的整个临时中央虽然一方面主张坚决抗日,但是仍然看不到国内各种关系的变化,仍然坚持关门主义政策,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张闻天在阐发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错误观点和策略的文章中,对十九路军将领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把他们看作是反革命的抗日军阀,把淞沪会战看作是“十九路军士兵在违反蒋光鼐、蔡廷锴等的命令之下的反日战争<sup>[3]</sup>”,并主张进行下层统一战线,“拥护士兵自动抗日的斗争,而反对他们的长官,利用一切机会揭破这些长官的欺骗<sup>[3]</sup>”。针对“一·二八”事变后在野

派别提出的各种“民主政治”主张,仍然无视他们的抗日要求和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矛盾,认为他们的目的无非是“好使得他们更能出力的来拥护这一统治”,是对革命运动和革命民众“民主的欺骗”,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继续揭破这些欺骗<sup>[3]</sup>”。

临时中共中央“左”的路线错误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广泛的抗日反蒋同盟军,丧失了组织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

## 二、突破“左”的路线

在国统区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遭到巨大损失而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不满;民族危机的加重和全国各阶层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也深深地影响和教育着张闻天,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张闻天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大致的了解。这一切使得张闻天开始进行独立思考,反思临时中央“左”的路线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自觉不自觉地突破“左”的思想束缚,在实际工作中做出调整,注意采取一些符合斗争实际的做法。在统一战线方面,他开始突破“左”的固定公式,注意团结更广泛的社会力量。这种突破首先体现在其负责和熟悉的宣传工作中。

### 1. 反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

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是“左”倾错误路线在文艺工作中的具体体现。20世纪30年代初的左翼文化运动是在反革命文化的包围和围剿中不断前进的,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左”的错误的影响,在“文艺自由”“论辩和”“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存在着否认“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的观点,犯有“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张闻天针对这种关门主义的错误,写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以纠正党在文艺领导方面的错误,指出“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这种关门主义不克服,我们绝没有法子使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接着分析了关门主义的两种表现,第一种是“表现在对‘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而文艺界的实际情况是“在中国社会除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文学之外,显然还存在着其他阶级的文学”,即“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排斥这种文学和批判这种文学家;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

我们的同盟者”；我们的任务是在正确估计那些小资产阶级文学作家的革命方面”，去“忍耐地解释、说服与争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实现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针对“文艺自由”辩论中存在的“左”的观点，张闻天指出了关门主义的第二种表现是认为“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工具’、‘政治留声机’的理论”。并指出了按照这种理论所评判的“文学自由”的实质所在，即“凡不愿作无产阶级煽动家的文学家，就只能去做资产阶级的走狗”，结果“显然大大的束缚了文学家的‘自由’”。实际情况是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中间，有不少文学家既不愿意做无产阶级的也不愿意做资产阶级的“煽动工具”或“政治的留声机”；他们愿意“真实的‘自由的’创造一些‘艺术的作品’”。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对他们指出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下没有文艺的创造的自由，阶级社会中不存在超阶级的自由，同时“还要去领导这些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为了争取自由而进行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在批判了关门主义的种种表现后，文章最后明确提出“要使中国目前的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坚决地打击这种‘左’倾空谈与关门主义，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使我们的活动，从狭窄的、秘密的、走向广泛的、半公开与公开的方面去”。<sup>[2]</sup>

《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少有的一篇鲜明的反“左”的文献。通过与以前贯彻“左”的错误路线的文章对比，可以看到在实际斗争锻炼中的张闻天思想上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左”的错误，改变了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和对策，不再把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来打击，而是根据民族矛盾的变化和客观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提出党在领导文艺战线的首要任务是结成文艺界的革命统一战线。其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它不仅是张闻天思想转换和发展的一个标志，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左翼文艺运动在正确轨道上蓬勃发展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张闻天作为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从党的策略原则的高度批判“左”的错误，标志着王明“左”倾路线已在党的主要领导人中产生了分歧，对于党的路线的转变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在实践中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得到及时纠正，促进了左翼文化文艺工作者与中间派的合作，开拓了左翼文艺运动的新局面。

## 2. 提出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思想

“尊重实践、坚持真理、勇于独立思考、勇于否定一切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sup>[4]</sup>是张闻天的真实

写照。在国统区长期的实践、体会和思考的过程中，张闻天的思想已经有了“左”的突破。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迁入中央苏区，张闻天亲身体会到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在苏区实际工作中所暴露的问题，同时受到毛泽东等人正确思想的影响，张闻天已经能够根据客观实际进行思考和认识，思想转变进一步加快，在一系列政策和具体事件上开始同当时“左”的错误产生冲突。在统一战线中，更加摆脱了以前的固定公式，根据时局的发展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提出了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思想。

1933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旗帜。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权利、武装群众）愿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作战的协定。宣言的发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表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新的变化。

但是对宣言的理解，张闻天和当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博古坚持教条主义的态度，从进行下层统一战线和打击中坚力量的固定公式出发，认为“资产阶级永远是反革命的，绝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sup>[5]</sup>。张闻天却从一二·九事变后淞沪会战的事实及对十九路军“左”倾政策的教训出发对宣言加以理解，大不同于博古。他认为“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sup>[6]</sup>。这表明张闻天已经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来理解抗日三条件，突破了只进行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的禁锢，思想上有了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萌芽。但由于博古的坚持，在宣言发表之后的十个月里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没有进行任何实践宣言的行动。

这种分歧更明显地表现在对待十九路军和福建事变的态度上。淞沪会战以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但屡屡受挫，加上本来就与蒋介石有矛盾，同时在民族危机日渐严重的影响下，蔡廷锴等将领开始响应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日三条件的宣言，主动同中国共产党接触商谈停战反蒋事宜。博古虽然不反对谈判，但看不到他们进步的一方面，认为这只是对方的诡计，是用新方法欺骗民众，只把谈判看成是一种宣传性的措施，因此在实际谈判中非常冷淡。张闻天却从实践抗日宣言和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反日反蒋的高度出发，一开始就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一起积极领导同对方的谈判，并最终在1933年10月份同对方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933年11月，蔡廷锴等率领的十九路军，发动福建

事变 ,并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 ,但是共产国际和博古仍然坚持关门主义的态度。针对这种错误 ,张闻天在福建事变的第二天写下了《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 ,严肃批评以博古为代表的关门主义错误观点。

这是一篇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文章 ,根据形势的新变化对抗日宣言作出了理论阐明 ,对博古的关门主义作了不点名的批评 ,并就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文章首先指出了苏维埃宣言的重要性 :“争取全中国广大的群众在苏维埃政权的影响之下 ,为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宣言的对象是对“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群众与下级军官”说的 ;“也是对于所有国民党的军阀们说的”。“只要谁真能接受我们所提出的三个条件” ,我们是“愿意同他们订立作战的停战协定” 。接着指出了关门主义的表现 ,提出了党的任务是“不是关起门来表示自己无产阶级的纯洁 ,而是经过这种协定来进一步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 。更为可贵的是针对对福建事变的错误处理 ,以及当时共产国际将统一战线的对象主要局限于下层的“左”的政策 ,张闻天通过对客观形势变化的分析得出结论 :“反对营垒中真正爱国的分子”有可能接受“同我们在一起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战”的口号 ,“我们要坚决的反对关门主义” ,甚至可以在“个别的地方进行上层的统一战线”<sup>[2]</sup>。文章虽然没有从阶级关系的变动来批评关门主义 ,但是从策略高度提出了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 ,不能不说是统一战线思想方面的一个突破。

但是由于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领导人没有在军事上给十九路军以直接的配合 ,再加上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 ,福建人民政府于 1934 年 1 月 13 日宣告解体 ,福建事变宣告失败 ,共产党也失去了一次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机会。在遵义会议决议中 ,张闻天再次总结了福建事变的历史教训 ,指出应该从积极方面扩大反革命“内部的裂痕” ;“同十九路

军订立停战协定 ,来推动十九路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sup>[2]</sup>。但是 ,博古等人却在“左的空谈之下” ;“根本不了解十九路军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sup>[2]</sup>。实际上这从政治路线上触及了党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

反“左”思想渐次发展到一定程度 ,必然会带来思想的解放和更新。在长征途中 ,张闻天彻底与“左”的错误决裂 ,在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 ,帮助毛泽东在党内确立实际领导地位 ,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做出了巨大贡献。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军事路线的转变 ,使中国革命摆脱了困境 ,张闻天同其他党的领导人一起对挽救党和红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遵义会议后 ,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的领导体制 ,领导全党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新“长征” ,并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 ,张闻天是实现这一切转变的理论奠基者和实践执行者之一。

参考文献 :

[ 1 ] 胡绳 . 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 [ M ]. 北京 : 中共党史出版社 , 1991 . 115 .  
[ 2 ]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 . 张闻天文集 ( 一 ) [ M ]. 北京 : 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 , 1990 . 240 307—312 411—416 534—535 .  
[ 3 ] 程中原 . 张闻天传 [ M ]. 北京 : 中国当代出版社 , 2000 . 177 .  
[ 4 ] 杨尚昆 . 坚持真理 竭诚尽智 [ A ]. 回忆张闻天 [ C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 1985 . 4 .  
[ 5 ] 博古 .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 A ]. 遵义会议文献 [ C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85 .  
[ 6 ] 张闻天 . 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 [ A ]. 遵义会议文献 [ C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85 . 76 .

· 简讯 ·

河海大学完成《大辞海(水利卷)》编纂工作

河海大学已经顺利完成了《大辞海(水利卷)》的编纂工作 ,书稿将于近日送交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于 2002 年决定组织编纂、出版《大辞海》。其中水利卷的编纂任务 ,出版社决定仍由水利学科最强并具有《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大型辞书编纂工作经验的河海大学来承担 ,并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河海大学名誉校长严恺教授 ,河海大学原校长左东启教授和时任河海大学校长的姜弘道教授担任水利卷主编。  
河海大学对《大辞海(水利卷)》的编纂工作十分重视 ,在主编领导下正式成立了由一批资深专家、教授组成的编纂工作组及编纂办公室 ,制订了由确定词目、撰写词目条文、对词目条文进行审查及修改三个阶段组成的编纂工作方案 ,确定了 14 个分科的负责人 ,明确了各自的职责。14 个分科为 水利总类、水利史、水力学、水文学、水资源、河道整治及河床演变、农田水利、防洪抗旱、港口工程及海岸工程、水力发电、水工建筑、水利经济、水利管理、现代知名水利工程 ,词目总数 1440 条 ,近 30 万字。有 44 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编纂工作。

( 本刊编辑部供稿 )